浮世喧囂
且傾聽
在紙頁翻動間
書的聲音

書聲 The Book Voice 新書快報

NO.23夏季號
2014年6月1日出刊
www.bookvoice.tw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493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49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人：廖志峰
發　行：允晨文化
企　劃：林　風
編　輯：謝珮怡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電　話：(02)2507-2606
劃撥帳號：0554-5661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設　計：東昇傳播

荊棘中的探索—在迷惘的年代！

◎尉天驄

一

歲末整理舊物，無意中重讀了老友鄭秀陶的舊作〈在一九五九的末端〉。一邊讀著，一些往事便又止不住地浮現出來。這篇作品發表在一九六〇年四月號我主編的《筆匯》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刊出之後，立即受到軍方政工系統《復興崗》週報政治性的指控。往事雖不如煙，現在再談那些膚淺無聊之事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一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那段日子，卻仍然有揮之不去的感觸。那個可以被視爲屬於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當年的那群朋友，有的已經離開人世，剩下來的也大都步入人生的晚年。秀陶大學畢業後，求職無著，就去越南一家公司任職，越戰後以難民身分去了美國，一直在一家老人院工作。幾年前曾返台一次。談起往事，也只是相互調侃一陣而已。有人說：時間可以化解一切，其實有一些事雖然看似過眼雲煙，但偶一思念卻總也別有一番情味，一時間難以化解開去。於是再次翻閱秀陶的舊作便又有了一次拋卻不掉的回想。一段回顧，也就成了一段歷史。

秀陶那首詩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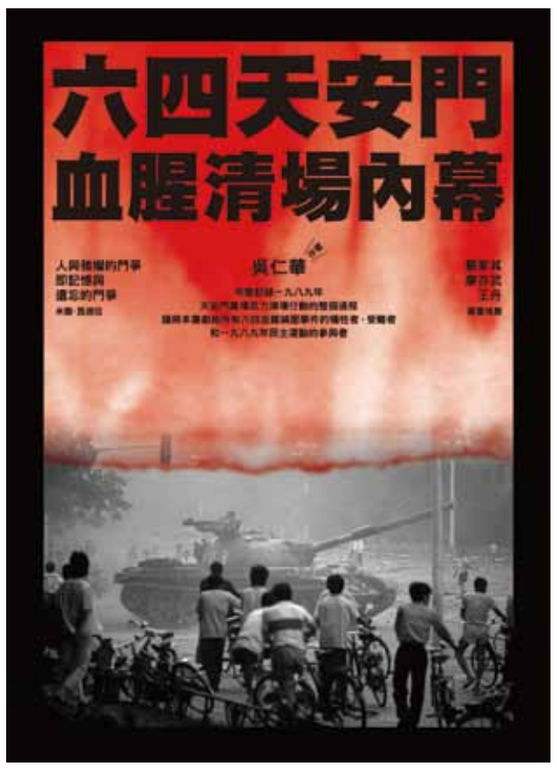
在一九五九的末端，塵埃散漫／在歷史如賣麵茶的哨子那樣響著／我插在褲袋裡的手躍躍欲試，我仍插著／到處響著呼吼，無聲地，超頻率地／起自久未運動的生殖器的那樣地／起自一文不名的空口袋的那樣地／在一九五九的末端集聚了三百六十五日的不適／蹺板的這頭低了／於是有生命哭著，哭著自母體內強拉了出來／有生命在街上流著，咬著手指，嚷著proko_ev的音樂／仍然只是感覺，在那裡拼湊著、撥弄著，七巧板樣／或者也抬頭看看天色，看看不像什麼的雲彩／或者也散散步，在無旗的桿下／或者什麼地……／塵埃散漫，該忘的都忘了／餓了就吃／在一九五九的末端／倦了就睡，或者不那麼倦

這些類似艾略特（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的愴然和無奈，今天讓比我們年輕三〇到四〇歲的一代讀起來，或許會不覺得怎樣，但是就我們這一群從那一年代走過來的人說，重讀一次，仍然會引發出某些難以言宣的漠然。前些日子，在與朋友談話時，相互之間想要找一個確切的字句解答我們走過的這一段歲月是怎樣的時代。講來講去，結果仍然是難以爲言。多少時候我也私下如此自問，得到的仍然是一片混雜。勉強去說，不過是隨著際遇的不同，一直在不斷地摸索而已。從懂得去觀察、思考自己的世界開始，便一直是那樣捉摸不定；有時是那麼幼稚、天真，聽得中意的便信以爲真，興奮激昂，自以爲懂得很多道理；有時是一廂情願，執著盲從，偶遇挫敗也會頹喪失意。如此一次又一次，就成了自己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是無法用樂觀或悲觀來形容的，只覺得一次又一次的累積，便讓人在其中感受到某種自發的力量。而每一次的矛盾、衝突，經過掙扎和折磨，也讓人覺得有了又一次新的成長。我曾經說過：在當代的詩人中，我最喜歡方思的作品，他的那首〈給〉，就一直讓我覺得那是我對已往人生的感受：

（文接二版）

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

◎吳仁華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已經過去十八年了。但由於種種原因，許多事實眞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爭議不斷。對於一起曾經震驚世界和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言，這是很不應該，也是令人頗爲痛心的事情。

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人與強權的鬥爭，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鎮壓事件之後，捷克統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記這件事，而捷克獨立知識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記這件事。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之後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共當局一再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極力掩蓋與　避六四血腥鎮壓的事實眞相。而海內外的許多有志之士，卻一直致力於「毋忘六四」的工作，儘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殺人者，呼籲人們忘記這件事，忘記這一天。

本人作爲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親身經歷者之一，尤其是作爲一名在北京大學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文獻學者，有義務和責任爲該事件留下一份可靠而完整的歷史紀錄。爲此，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初一個寒冷的深夜，本人冒死游過海灣，穿過密佈中共軍警的小島，爬過齊腰深的漫長海塗，遍體鱗傷地來到自由的彼岸。儘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本人依然由衷地感到慶幸，因爲終於獲得了自由發言的權利和機會，以履行自己作爲歷史見證人和歷史文獻學者的神聖職責。

長期以來，本人念茲在茲，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直至今日，終於完成了本書的定稿工作，並將出版發行，了卻了多年來的一樁心願。

本人曾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就讀七年，先後獲得學士、碩士學位，深受中國考據學傳統的影響，崇尚實證；後來又在法律專門院校——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深知法律的尊嚴。在此，我謹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書所記敘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眞實，絕無絲毫的虛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願意並完全能夠承擔一切責任。

本書的寫作嚴格遵循中國歷史文獻學的傳統和規範，主要記錄本人的親身經歷，但由於個人的親身經歷總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個曾經引起世界矚目的重大歷史事件，因此本書中引用了一些身分可靠的當事人的回憶和其他相關的資料，凡是引用的部份都一一註明了出處。

本書主要記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的整個過程，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開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鐘結束。這是迄今爲止最完整的一份紀錄，也可以說是唯一一份紀錄。

本書初稿完成於一九九〇年五月，字數約五萬字。從一九九〇年六月至今，香港《當代》雜誌、美國《北京之春》月刊、美國《世界日報》主辦的《世界週刊》、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一書，先後摘錄發表了本書稿一萬餘字的內容，題爲《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或《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網站有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事件完整記錄的唯一一篇文章。本書目前的字數近三十萬字，內容更爲豐富翔實，份量遠遠超過上述的這一篇文章。

本書不僅完整地記錄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的整個過程，而且對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作了具體而突出的描述，例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四君子」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與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情況；柴玲、李錄、封從德等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從拒絕撤離天安門廣場到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的過程；六部口坦克追逐輾壓學生撤離隊伍事件；學生領袖郭海峰「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一案的眞相；醫務人員在槍林彈雨中捨生忘死搶救受傷者、記者冒著生命危險記錄歷史眞相的英勇事蹟；積極抗命的解放軍陸軍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和消極抗命的解放軍陸軍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師長許峰的故事；立功受獎、升官晉級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等等。

本書也著重闡明了一些長期存在爭議或讀者感興趣、有疑問的問題，例如：1 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本來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和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毋須特別予以討論或說明，但由於在這個問題上長期爭論不休，許多讀者也心存疑問，因此本書具體敘述了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雙學士學生程仁興等人在天安門廣場遇難的情況。2 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坦克是否曾經輾壓帳篷，以及帳篷中當時是否有學生。3 解放軍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銷屍滅跡，導致許多遇難者生不見人，死不見屍。4 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承擔的任務和表現，具體記錄了各個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鎮壓過程中的情況，明確指出陸軍第 38 集團軍在鎮壓過程中殺人最多、最爲賣力，其次是空降兵第15軍。5 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命令和開槍命令下達的情況。

本書在圍繞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這個主題的同時，對復興門、木樨地、西單路口、天安門城樓附近等主要開槍殺人現場的情況也有大量的敘述，期望讀者因此能夠對整個六四血腥鎮壓事件有一個較爲完整的瞭解。

本書還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了北京各界民衆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爲了保護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平情願的學生，奮不顧身地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英勇事蹟。爲此，北京各界民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正如本人在書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爲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 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時至今日，本人仍然認爲，北京各界民衆視死如歸、捨身取義的精神，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在完成本書寫作之際，本人特別要感謝的是不久前被中共當局以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判刑五年而入獄的香港資深記者程翔先生。一九九〇年三月初，在本人流亡香港之時，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劉銳紹先生的熱情鼓勵和支持，寫出了關於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字數約五萬字的文章，並在他主辦的《當代》雜誌上首次發表。後來，洛杉磯華僑韓媽媽捐助了兩千美元的印刷費，由《當代》雜誌將這篇文章印成方便於送入中國大陸的小冊子。

最後，謹將本書獻給所有的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的犧牲者、受難者和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同時也獻給我的八十高齡的母親。當年爲了六四死難者，爲了被捕入獄的好友同道，爲了向國際社會說明眞相、呼籲營救，我捨棄了個人的大好前程，在一個只有攝氏七度的風雨之夜，九死一生地游過海灣，抵達自由的彼岸。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終捨棄不了親情，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地大。十七年了，我不僅不能對母親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上一面都難以做到。我苦難深重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文接一版）

倘若每一思念，每一渴望，／每一充盈苦難的心跳都是存在，／那麼，多少次短暫而永恆的經驗，／我已活過，／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你是遠赴天邊的西風，／我是那鷹追趕希望，／你是智慧，／我是以有涯逐無涯的凡人，／擲滿懷信仰的一生於眞理的等待。

有人問我：「你對生活意義的思考，是不是受到文學的啓發？」我自己覺得並不完全如此，但也不能說沒有關係。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抗戰結束不久，兵荒馬亂，一切沒上軌道，我因爲聽人說書，就生吞活剝地讀了《隋唐演義》、《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岳》、《七俠五義》一類的章回小說，完全是趣味性的滿足，就連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雖然接近現實，也只是在其中感受到校園倫理的溫暖而已；因爲那時在我們家鄉小縣城裡，學校還時興罰跪；根本談不上啓發。直到一九四九年，經過一段流亡的生活，到了台灣，在台北的師院附中就讀，初中二年級的導師是史惟亮先生，他教音樂，鼓勵同學唸課外書，每週的導師課，都要同學輪流作讀書報告。輪到我的時候，不曉得什麼機緣，竟然把圖書館的一部舊書《易卜生集》借來，老老實實地把它讀完。那本書是潘家洵翻譯的，書中胡適所寫的〈易卜生主義〉讀了以後，讓我在觀看世間的事物時，有了自己的思緒。

情況是這樣的：

很小以來，由於受到傳統的正規教養，一直對世間的事物，只作正面的思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至於循規蹈矩就成了一條必然追循的道路。但是，在易卜生的作品裡，所見到的卻是家庭間的虛僞、社會上的假仁假義。於是他的《娜拉》、《傀儡家庭》、《社會棟樑》、《國民公敵》都帶給我很大的撞擊。書中附錄中有一段胡適的解說，讓我一直記得，他說：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眞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汙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這些話是在正規教育中聽不到的，於是就很感動，而《國民公敵》中司鐸門醫生力抗社會惡勢力的那段自勉的話：「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往往是最孤立的！」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由此讓我想到人的尊嚴的問題。

後來的思路發展也與史老師有關。史老師住在學校的單身宿舍裡，我們常去跟他聊天。他有一本從大陸帶來的舊書《貝多芬傳》，是傅雷翻譯的羅曼羅蘭（R. Rolland）的作品，從他的談話裡，我們漸漸認識到音樂和藝術的眞正價值，而且也知道了羅曼羅蘭，以及他的那部《約翰．克利斯多夫》。正好圖書館裡存有舊書，於是就輪流借來閱讀。在這之前，好友送我一部美國小說家德萊塞（T. Dreiser）的《天才夢》，是鍾憲民譯的，我懷著夢幻的企望想在這部作品裡尋找著浪漫的天才生活，結果所見到的卻是一片極庸俗的，讓人窒息的現實。讓人一片沮喪。

那時剛從流亡的困苦生活中安定下來，茫然之中，極其需要得到鼓勵。羅曼羅蘭就適時地成爲我們的引導。由於得到鼓舞，有些同學就把書中的一些話當作國文課本那樣背誦，直到今天，我還能一句不錯地背得出來，而且作文課時不斷地模擬他的句法，感到自傲。像下面的句子，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我們周圍的空氣多麼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質主義鎭壓著思想，阻撓著政府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唯有眞實的苦難，才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這些話，當時雖然未能有著實質的了解，聽起來　很有鼓舞的作用，但也只是興奮而已，並沒有開始作深度的思索。直到高中時，因爲一位生物老師的啓發，才漸漸學習去推想一些現象後所蘊藏的問題。

有一次老師講達爾文，說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我不知爲什麼說出「那多可怕！」老師在下次上課時，就拿了一本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給我看。對我說：「這本書是修正達爾文的，認爲互助才是生命的本質。」他知道我讀過巴金的小說，就告訴我：「巴金是李蒂甘的筆名，他信仰無政府主義，景仰兩個人，一個叫巴枯寧，一個叫克魯泡特金。巴金的筆名就是由此而起的。」因爲這個機緣，後來我就想盡辦法找到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和《麵包與自由》來看。讀著，讀著，就出現了一種嚮往，覺得自己長大了。——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是眞的長大，而是某一種夢的追尋。

但是，受到這種影響，在高中畢業，特別進入大學以後，便開始覺得對人生有了某種企望。其實仍然只是吸取營養的階段而已；由是精神開始有著飢餓的感覺。在制式教育讓人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之時，我的很多朋友便由此走進了宗教的世界。而我則沒有規律地搜集各種似懂非懂的書刊來讀，以彌補內心的空虛。這些累積，在不知不覺之間也有某種力量孕發出來，促使自己向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世界去追尋、探索。那時上世紀剛要進入六〇年代。

二

那時韓戰已經結束，在美國防衛條約的保護下，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偏安粗定的時代，但由於連年戰亂和顚簸流離遺留下來的沉壓還沒有完全散去，大多數的人，幾乎都依然活在倦怠和無奈之中。雖然國際上的陰霾和島內現實的窒悶仍會不時地讓人憂心，卻很難再有甚麼事會使人激動起來；往事與舊夢雖然仍然也會帶給人少許猶疑，經過時間的沖洗，卻已漸行漸遠，大都成了過去。接著下去的便是得過且過，使得疲憊和慵懶普遍成爲流行。回想起來，便止不住想起當日的幾行詩。這些詩，當時讀了並不覺得怎樣，過後一想，倒覺得非常貼合現實。其中兩句是黃用寫的：

我已安然於被統治下的和平，／因我熟知那種肯定。

另兩句出自唐文標之手：

逐水草而居，牛羊逐水草而居。／且安心地隨衆人逃荒吧！

這就是台灣當時的景況。在連年的騷亂與惶恐之後，不僅從外地逃亡來的人，難以再承受過多的勞累，即連久住本地的居民，生活的形態也一一成了類似逐水草而居的牛羊。每天只能數著日子打發時間，所謂希望，也只具有柴米油鹽等的形而下的意義，只要災難沒有落在自己肩上，就已算是幸福的日子。沒有怨懟，也沒有興奮，一切都處於無用的等待中。但是，人總是要自己肯定的，年輕的族群爲了要塡補內心的空白，便慣於用由外地舶來的語言宣示自己的存在：「我們是失落的一代！」——一副猶然自得的樣子。

這是一個喘息的時代。經濟開始復甦，整個社會漸漸由窒息走向疏解。爲了迎接新的現

實，當局便透過各種管道引導大家去讀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現在不必再去講它；僅就書名《風雨中的寧靜》，就可讓人想見它的用意所在，也一語道盡了當時現實的封閉狀態。由於一切仍在風雨之中，這寧靜也不時地會使人感到漠然和懶散，覺得天下的事似乎都跟自己不生關係。這是歷經滄桑後的無助；面對眼前的一切，只能木然地看著，即使有任何意見也不願意表達出來。那時我住在還是鄉下的中和，在這樣的處境中有一些日常所見的印象，至今還留在我的心上，揮之不去。

五十多年前的台北是非常樸素的，經過一段時期的不安，樸素得有些單調，它被包圍在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之間，重慶南路和衡陽路一帶便於焉成了市的中心。從台北火車站走出去，到了廈門街、水源路一帶，感覺上便已到了邊疆。隔著新店溪往中和一望，便覺得那裡就是塞外。那時候，跨越新店溪的中正橋還叫做川端橋，橋面太窄，車輛只能單向通行，於是橋兩端的警衛便不停地揮舞著紅、綠旗，維持著兩岸的交通。

在橋的南端，靠近中和的河灘，有一片地方，那就是人人皆知的馬場町。隔不了幾天，就有一些被稱爲「政治犯」的人在天剛亮之前，被押往那裡處決。

那時候，中和還沒有把其中一半劃爲永和。從廈門街一過橋，接連著的便是一片開闊的土地。由於人煙稀少，大家都會挨著次序叫出其間的主要地名：頂溪、溪洲、公路村、保健站、枋寮。而枋寮便是鄉公所的所在地，那裡有兩條舊的街道，可以算作這地區的中心。由於當時還沒有自來水，經常可以見到挑水的人在路上走過。這裡每天有七、八班公路局的車子開往台北。爲了避免遲到，學生大多趕搭頭兩班車子上學。車子上了橋，就經常看到不遠的河床上排列著一些屍體。有一次竟然有十幾個之多。死的是什麼人，到了傍晚放學回家的時候就知道了。火車站的布告欄大張的告示上已經寫得非常清楚；每一個名字之上都用紅筆畫上粗大的「V」號。面對這樣的告示，起初還讓人心驚，日子一久，便也視爲平常，不以爲意了。

而再往橋的北端，也就是靠近廈門街、水源路一帶，有一片與河堤相接的河床地，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被搭建成幾排相聯的茶棚，起先是外省人約會、尋找親友、打探消息、尋找工作的所在，後來便成爲公衆活動的場所。泡上一大杯茶就可以待上一天。幾乎每一個座位上展示出來的都是茫然、無助的臉色。日子久了，就有一些小販穿梭著，販賣小吃。也有人在黃昏以後，在那裡講說相聲，其中的吳兆南與魏龍豪直到晚近大家還記得他們的風采。在早些年，有人在報上發表文章，把當時這一帶的地方比喻爲東晉初渡時的「新亭」，幾年過去，這裡卻已成爲小市民廉價的娛樂場所了。如此不久，一個可以名之爲安閒的時代，也就隨之推展開來。

105號公路：泰緬邊境故事

◎黃婷鈺

陰雨冬日的清晨六點，與友人暢快聊天至天光微微。

帶著即將衝破蒼穹的想像，一步步拉著，些許疲累的身體前行。

與友人揮手一別，互道珍重，獨自踏進機場。拖著重近三十公斤的行李箱，裝滿要捐贈給孩子的衣物，自己的肩上，背著側背袋放著自身衣物，我吃力而緩慢的走著。寄掛了行李，機組人員看見我吃力地走走停停，主動前來關心：『小姐，妳不托運？』『我已經托運行李箱了』，『妳一個人要去泰國觀光嗎？』『不是，我要去泰緬邊境一年。』『那是哪兒？去做什麼？』『做志工。』『難怪你行李不少。』『那箱是要捐贈的小孩衣物；我自己衣物在手提袋。』『這麼少？你要去一年耶！』……於是，我的手提袋，也讓路過的空服員們，在此起彼落的討論聲中，一起托運上了飛機。

猶記得離台前晚，對於隔日即將啓程的未知之地，那心情大概是有種坦然迎接，交雜著興奮之情難掩，和更多的探索的好奇。徹夜未眠的我，一路從起飛睡到了降落被空服員叫醒，朦朧間便是個煥然一新的國度。

作爲一個全然的外國人，對於初踏之地：泰緬邊境，少了實地的幻想，只充滿好奇。因緣際會，我來到了泰緬邊境的邊鎭，似乎也映照出自己的渴望：將年輕歲月使力拋出，一如張騰空飛起的白紙，薄而輕盈，用軌跡繪出心中模糊印象的地圖。

猶記得清楚，第一次跟當地朋友用英語自我介紹：『大家好，我叫Yvonne。』有的人笑著點頭，有的人詢問式的重複一次：『’Ewan’?』我重複一次：『Yvonne。』下次見面時，多數當地朋友和我打招呼，都說：『Hello，一丸。』自己都覺得好笑，不過是個名字嘛。原來泰國人不習慣發V的音；久而久之，我也都跟人說：『Hello，我叫一丸。』自己聽久了，人家叫久了，也覺得挺好玩。泰緬邊境的朋友們都一丸、一丸的叫著自己，聽起來也挺有意思，像跟小丸子有什麼親戚關係似的。

無論在台灣或我後來求學的歐洲，自己經常面對這個提問：『當初爲何來到泰緬邊境？』

思緒回到了，最初的起心動念，有如孩童般懵懂而單純的思緒：站在海洋環抱著的家鄉，讓我想走出去，觸摸未知，感受那不同的世界。這心念，讓大學剛畢業的自己，幾乎是不顧一切，走阿跑的、還撩著裙擺跳躍著，離開故鄉台灣。

這心念的養成，部分大概是從小到大，一直著迷在台灣巷弄走晃的微小發現，那些讓自己在心裡尖叫的探索與驚奇延伸；這些探索，直接反映出當時自己對於台灣學校罐頭式的閱讀煩悶，對於社會體制對年青人的主流狹隘期待 （成家、立業、下一代）。對於向世界探索的強烈渴望，隨著年齡增加，逐漸超越了人類地理上的疆界國度。

依舊清楚記得那感覺：我好想旅行，那迫不及待，不顧一切想窺看世界有多大的心。眞正，驅使自己邁出腳步的，大概是那份年輕的無知與好奇吧！所以，泰緬邊境之地，非我一心一意選擇前往的；反而是，在那樣的當下，有這樣機緣，將自己放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親身長居，貼近當地情狀的生活著。

水流近兩千里的『母親之河』，蜿蜒著整個泰國與緬甸的邊境。邊境長路，散落著長久居住的民族：他們來自緬甸、泰國、中國、到更遙遠的印度、孟加拉、越南等。自從國界概念被掌權者用於劃定地域疆界後，世代遷徙綿延，許多民族，也隨著被一分爲二，或更多。

克倫族（Karen）就是明顯的例子。克倫民族，據說是最早居住在泰國與緬甸邊境的人種之一。當英國殖民者一刀劃下緬甸國界，往後，克倫也有了來自緬甸的克倫人，與來自泰國的克倫人。每日往返的邊境，搭乘的舢板小船，吆喝著的臉頰汗水，頭頂著貨品的滿足笑意，都描繪著世居於此的小民百姓常態。對他們來說，熟悉的重複往返，語言的混雜，異文化的流竄融合，在在都早已衝破了，國界爲疆界的侷限。對岸、這岸；緬甸、泰國；我們、你們；戰亂、平和，那麼一瞬間，都煙消雲散了。

以克倫人爲主的緬甸難民營，隨母親之河，蜿蜒著泰緬邊境。地理面積最大，也曾爲東南亞『稻米之鄉』的緬甸，二次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殖民勢力與複雜的宗教、文化、政治脈絡裡，也成爲了人類記錄裡，最久內戰的眞實戰場。電影『第一滴血』續集中，聚焦描繪了世居在此的克倫人如何遭受緬甸獨裁者的暴力趕盡殺絕。電影本身，縱使劇情灑狗血過了頭；片中許多邊境戰場取景，眞實帶出了緬甸東部境內，遙遙無止期的戰鬥。

想想，每日睜開眼，仰望漏水的簡陋葉編屋頂，腦海浮現：明天能再見嗎？難民營裡居住的十幾萬人，懷抱回家的夢想，恍如隔世般，卻也在營裡成了家，有了下一代。二十年，足夠讓哇哇墜地的娃子茁壯，成爲照顧長者的新世代；營裡，老者與新世代，卻仍舊盼望著走出難民營，深深的呼吸，那名爲自由的空氣。

草色連雲一隔膜

◎高爾泰

百年人生，有許多維度，在每一個維度上，都有許多空洞。比如在時間這個維度上，一場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場「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場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車挖掉你半小時，算是小空洞。有些維度無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無邊，這個維度就算沒了。

沒了這個維度，還有別的維度，還有人生。維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沒有價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聲，是文化人類的珍品；活在輪椅上說不出話的霍金，是科學界無與倫比的巨星。雖如此，畢竟遺恨。

平凡微賤如我輩，生存努力的成敗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性格傾向和人生體驗的維度。這些主觀維度，同樣有其空洞。其中之一，就是隔膜。未進入意識的、意識到了跨不過去的，和事後發現已成心殤的隔膜之洞，多到不可言說。這裏略說數則，不辭掛一漏萬。

一、知更鳥飛走了

剛搬到紐澤西海邊那棟老舊小屋時，我在廊簷下栽了一株忍冬。長得極快，幾年就爬上和覆蓋了大片屋頂。縱橫交錯的藤蔓枝葉，從欄杆到屋簷織成了一幅帷幕。春夏之交，花期很長，老遠都聞得見清淡的幽香。

那年在廊簷下，發現了一個知更鳥的窩，很精緻。裏面有兩個橄欖大小的蛋，翠綠色，點綴著一些大小不同帶著金色的黑點，很美。經常地，有一隻鳥在裏面孵蛋，另一隻鳥出去找吃食，時不時回來餵牠。有時候也一起飛走，丟下兩隻蛋，在春天的陽光裏曬著。我們非常慶幸，有了這兩個可愛的鄰居。

不幸的是，這個窩的位置，恰恰在廊簷的正下方。一旦下雨，簷溜如注，縱不沖散，也會泡爛，更不用說在裏面孵蛋了。海邊林帶，多風多雨，遲早要來。我趁牠們不在，把鳥窩所在的那一叢藤蔓，稍稍拉了一拉，綁在靠裏面的粗枝上。鳥窩離開了廊簷，大約三公分左右。

我幹得非常小心，枝葉的向背，都力求保持原樣。鳥窩端正穩當如初，連裏面的蛋，都沒有絲毫滾動。

但是鳥兒回來，不像往常那樣直接飛進窩裏。而是停在離窩不遠的枝丫上，側著頭朝窩裏看。一忽兒跳上另一根枝丫，從另一邊側著頭朝窩裏看。看一看窩裏，又看一看四邊。顯然是發現了變化，相信變化就是危險。就這樣，兩隻小鳥繞著窩，上下左右跳躍，很久很久，都不敢進去。

終於，呼啦一聲，同時飛走了。從此沒再回來。

記得有誰，好像是尼采說過，信仰掩蓋眞理，有甚於謊言。如果世俗一些，把迷信、成見、經驗主義之類都納入廣義的信仰範疇，起碼這兩隻鳥兒，還有我，可以爲此作證。

二、愛之罪

我小時候，視父親比母親更親。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腳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著耳朵拽下來洗的是母親；帶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樹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膚說沒關係它自己會好的是父親。後來上村學，父親是校長又是教師，教我和別的孩子讀書，嚴格而有耐心。愛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鄉解放時，我上初中二年級。因爲喜歡山野，假期裏常到山鄉去玩。「山鄉」是湖那邊深山老林裏的一些小村，抗戰時期我們家曾在其中一個村上避難，一住八年，滿村鄉親。

那次我去，村上在「土改」，來了些外地人。其中一個，我認識，叫劉法言，是我在縣立中學上學時的學長。比我高兩班，大十幾歲。我常和他同打籃球。他牛高馬大，我卻能搶得到他的球，總覺得他大而無當，很是瞧不起。後來我留級，他畢業，沒再見過。

村裏見了，他很熱情。笑著迎過來，說我長高了。說那時只到我這裏（指胸口），現在到我這裏了（指下巴）。問高老師（我父親）好嗎？又說見了你爸，代我問個好。我說，嗯。心裏納悶兒：他來幹嘛？

回到家裏，在飯桌上隨便地說到，看見劉法言了。不料父親一聽，顯出緊張恐懼的神色。放低了聲音，鬼祟地問道，他的態度，怎麼樣啊？

這表情和聲音，使我感到羞辱，氣得說不出話來。

父親沒覺得我的反應，小心翼翼地又問，他同你，說話了嗎？

我不答，他又問，說什麼了嗎？

我更氣了，粗暴地說，沒說什麼。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親和二姐追出來，一把抓住我，惡狠狠地說，你怎麼能這個樣子！我們家在山鄉有五畝半地，出租，要是被劃爲地主，不得了啊。我還在氣頭上，說，「有什麼不得了的」，扭頭就走。母親又一把抓住，說，劉法言是土改工作隊隊長，他說什麼了？你倒是說呀。

我不說，姐姐捧住我的臉，問，是不是教你要劃清階級界限了？

我大叫道，見鬼了！掙脫，跑掉。

幾十天後，消息傳來，山鄉劃成份，我們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慶幸，很是歡喜。但是一年後，城裏搞土改，父親還是被弄成了地主，後來又加上右派，批鬥勞改慘死他——怕得有理。

三、無賴的盛宴

當年在外地上學，想家想得要命，不敢回去。畢業後當了右派，不能回去。一別十幾年，很少通信。來往信件，都要經過檢查。爲了安全，也爲了不讓對方擔心，信上互相都說，自己一切很好。

十幾年後第一次回家省親，家中已只有母親和二姐兩個。

一個「地主婆」，一個「右派」。給魚行剖魚，給工程隊削舊磚頭……都是髒活累活，時受訓斥。工資是象徵性的，幾近於無。

上工前，收工後，她們在後院種了些瓜菜、養了些雞鴨，貼補生活。但又捨不得吃，粗茶淡飯，一點兒一點兒地省下，曬乾留著，等我回來。

在我到達以前，她們清理和修補了兩間老舊小屋，收拾得乾淨整齊。回到家裏，看見窗明几淨，地板光亮。床底下滿壇滿罐的黃豆蠶豆紅豆青豆花生芝麻，屋樑上懸掛著醃魚臘肉和風乾的雞鴨，很寬慰。說，看到你們過得這樣好，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短短一個月假期，我把她們所有的儲存，包括幾隻養著下蛋的雞鴨，都吃得精光。吃著，感覺到她們看我吃東西的快樂，有甚於她們自己吃東西的快樂。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讓她們如此快樂。

走的時候，我容光煥發。想都沒想過，我把家裏吃空了。她們倆又將從零開始，重新苦巴巴地，對付那饑餓殘酷的年代。居然一直沒想。直到母親過世三十多年、二姐也已經八十五歲的現在。

人在美國，很偶然地，和小雨說起那一段往事。小雨狠狠罵了我一頓。說我沒心沒肺，簡直像個無賴。說你怎麼就沒想到，那是她們多少年來，一點兒一點兒從自己嘴裏剋扣下來的積蓄？怎麼就沒想到，要給她們留下一些？還心安理得？！還樂？！

東魚國夢華錄

◎王幼華

秋日夜宴荊棘園

我的小說創作由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雨季過後〉開始，直到今年已有三十五年了，此次輯錄的主要是短篇小說。收錄在這個集子中的，呈現了多年來創作的主要特色，也是個人認爲重要的作品。歷年來閱讀我小說的讀者，常常談到知解與詮釋的困惑，事實上作品完成後我也面臨同樣的迷障，並不能完整說清楚創作時的動機和情境，顯然它已成爲獨立存在的個體。這其間的歧義與縫隙，偶爾在評論者的論述中被解說、被發現出來，但大部分還是在誤讀與作者自我訴說的狀態裡。至於那些沒有發言的「隱藏讀者」，因爲不可查知，就僅能期望「暫時相賞莫相違」了。

一般來說，人們在新書發表會、就職典禮、歡送會、喪禮、紀念會等，都會邀請重要貴賓參加，用意上既是宣告也是慎重。典禮中邀請適當的人上臺，說一說與主人的關係，推崇當事者的可敬表現，凸顯其人優點，減去枝節，使場面合宜而恰當。當然除非蓄意鬧場，不以爲然者，通常不會出席。歷史上有兩場知名的聚會，這兩場都是在春光明媚時舉辦的，地點也選在花木繁茂，景色宜人之處。其一是王羲之的「蘭亭宴集」，另一是李白在「桃李園」的歡宴，聚會的參與者是親人和文友。這兩會之所以會流傳後世，是主人書法和文章的雋雅精妙，他們呈現了某些永恆的、難以超越的印記，令人低迴詠讚。我非名門貴胄，體無仙氣，這本作品集的出版，大約無法舉辦類似的宴會，也不請貴賓說些體面的話。不過，爲了讓可敬的閱讀者，能較順利的進入我所構築的文學世界，在秋風冷肅、夕陽若血的某一夜晚，決定在荊棘滿地、枯樹蕭疏、烏鴉聒噪的「荊棘園」，宴請影響我創作的重要人物。經過一番斟酌，開列名單如下：釋迦牟尼、耶穌、孔子、杜甫、杜斯妥也夫斯基、梵谷、佛洛伊德、魯迅、黑澤明、卡繆、卓別林等（可能漏掉尼采）。

衆賢們接到我的邀請後，欣然的由四面八方陸續來到。他們不煩事主，各自帶來喜好的食物、菸和酒，自在入席。當晚賓客與主人，賓客與賓客之間，做了無窮盡的、不可思議的對話，激起了無數的機鋒，晃動了巨大的思辨波濤，成就了不欲人知的勝場。畢竟是個難得的聚會，衆賓客淋漓盡興之後，便各自怡然的離去。

荊棘園之會的殊勝，是難以記述、言詮的。畢竟再美好的盛宴， 總有人疲慮乏、燈熄酒盡的時候。看著空去的桌椅，不免感到激情之後的惆悵。幸好，他們的身影可以在我的作品中，若明若暗、糾纏不已的「 看見」，並不會就此寂然的消散。

座談會訊息

《漫畫經濟史的趣味》
新書發表會

日　期：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2:30~4:00(2:00入場)
對　談：賴建誠・張鳳儀
地　點：水牛書店（台北市瑞安街222巷2號）
主　辦：允晨文化

《靈機一動》
新書發表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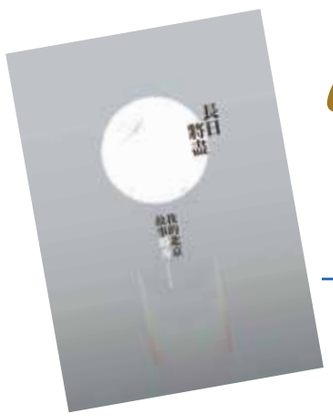
日　期：2014年6月28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2:00~4:00(1:30入場)
主　持：陳竹亭｜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主任
主　講：林天送｜臺灣大學化學系客座教授
與　談：牟中原｜臺灣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
地　點：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主　辦：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
協　辦：允晨文化

《105號公路》
新書發表會

日　期：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時　間：晚上7:00~9:00(18:30入場)
主　講：黃婷鈺
地　點：金石堂城中店3F生活學堂
（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19號）
主　辦：允晨文化

《荊棘中的探索》
座談會

日　期：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7:30
主　講：尉天驄
地　點：虎尾厝沙龍（雲林縣虎尾鎮民權路51巷3號）
主　辦：允晨文化



懷想20世紀80年代

——寫在《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出版之前（下）

◎韓秀

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被選擇出來的記憶是歷史的一小部分，經過長年沉潛，這些記憶重新排列組合，成為小說……它們沉重如鉛塊，它們有如一面鏡子，折射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

這一幕很自然地被我放進了〈樓上樓下〉。1989年8月14日完成，同年10月24日發表於台北《聯合報》，10月25日至27日在美國《世界日報》連載三天，1992年春由台北Chinese Pen 翻譯成英文刊出。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來寫八九民運，這一篇是最早問世的。

這一幕對Jeff刺激極深，九〇年代，我們駐節高雄，他在台北故宮的演講中談到這件事，「在這個世界上，需要怎樣的一種文化才能孕育出這樣喪盡天良而且毫無感覺的一種人。這人在做了這樣的事情之後仍然能夠正常作息不受干擾，這已經不只是背叛、不只是罪行，這是邪惡。」

台北的來信是無比溫暖的慰藉

相對於這些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台北的來信是無比溫暖的慰藉。自從1983年10月24日我給魏子雲教授寄出第一批有關金學的資料以後，陸續收到魏教授新書，馬上轉寄大陸金學界。之後，魏教授的研究在大陸學界引發激烈討論，同時贏得極大的尊敬。

來信最勤的還有瘂弦先生，他對大陸作家的動態十分關心。我們在北京期間，「清除精神汙染」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在種種複雜的情勢下，瘂弦先生持續不斷地表達他熱誠的關切，給許多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終於，大陸作家投稿聯合報系，出現高潮。先是紐約（1986-88） 然後是華盛頓（1988-92）成為大陸與台北之間的中間站，轉寄信件與稿件。我們在92年來到高雄，這個轉寄的工程才漸漸收尾，到了93年才完全結束，前後整整十年。首先，在大陸無法見天日的稿子飛到了台北。同時，瘂公力邀三十年代老作家的稿子，1988年4月，特別來信說明，「端木、吳祖光、冰心、趙清閣的文章都可以約。約稿時，沒有題材和體裁方面的特別要求，寫什麼都可以。」

這是失去創作自由數十年的老作家們最樂意聽到的聲音。何況，瘂公是名副其實的副刊王，主掌四個副刊。只要「文章性質適合各地讀者」，便可以納入「一篇文章天下知」專欄，四個副刊同時刊出。更何況，聯合報系致贈最高稿酬。這都是飽受壓制的老作家們未曾見過的，於是我看到了無數將要飛往台北的信件裡那滿溢的喜悅與感激。

吳祖光先生、新鳳霞女士、端木蕻良先生最先響應。祖光伯伯的電影劇本《孟姜女傳奇》與鳳霞姨的〈被賣〉都在1988年交《聯合文學》發表。發表之前，《聯合文學》編輯陳平芝先生甚至親自輾轉來到北京與祖光先生伉儷見面以確定他們授權刊出。端木先生〈螞蚱〉一文於1988年6月3日在《聯副》刊出，編者加了一個極為醒目的標題「海峽兩岸首次發表：三十年代作家端木蕻良為聯副寫的第一篇文章」。編者按語更將其視為「建構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的契機」。聯副還邀請秦賢次先生撰寫〈關於端木蕻良〉，同日刊出。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記得，《聯合報副刊》對老作家的珍惜之情由台北而美國而大陸，終於引發出無法止歇的感慨。有了第一篇文章之後，當然有第二篇，有更多篇。1988年，端木伯伯不但自己給聯副寫稿，也邀請蕭乾、艾蕪等老作家為聯副寫稿。而他自己也一直與瘂公保持著親密的友誼。瘂弦先生與清閣姨是鄉親，清閣姨信賴瘂公，瘂公不斷為清閣姨安排出版機會，有過很融洽的合作關係。

吳祖光的清醒、沈從文的沉默

瘂弦先生為聯合報系爭取到許多來自大陸的文稿，也給大陸老、中、青作家、學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來，偶爾談起，瘂公總是帶著溫暖的笑容，簡單說一句，很高興，很有意義。

祖光先生利用一切機會公開呼籲面對文革之類的政治災難。所謂的「文革紀念館」杳無蹤影之時，《闖江湖》劇本於1978年12月完成，1980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84年拍成電影。影片尾聲部分是一份長長的名單，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戲劇藝術家的名單。一排排的名字伴隨著哀樂緩緩地播映。不需要任何的解說，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是誰，知道他們有多麼的傑出，知道他們多麼地值得世人珍惜。然而他們被踐踏，他們死於非命。淚眼相對，祖光先生說，「這樣的事，我們一定要做，再難也要做。再不做，就來不及了」。到了1989年，我才痛切地了解，為什麼祖光先生會說「來不及了」。

祖光伯伯和鳳霞姨都是極為清醒之人，對中國社會的種種虛假看得極為透徹而且直接地說出來，毫不含糊。沈從文先生也是極為清醒的哲人，但是他基本上沒有聲音，他的沉默，他的微笑蘊含著極多的內容。感謝周有光、張允和伉儷幫忙安排，83年11月，我和兩位長輩一道去看望了沈伯伯。前門東大街三號五樓，極為狹窄的居室，四周全是書，層層疊疊漫無邊際，中間一張藤椅上，坐著這位滿臉笑容的老人，我心目中最偉大的華文小說家。從這天以後，每隔十天半月，我一定會到沈家去，我的習作也曾經拿給沈伯伯看。他很喜歡，讓我感覺非常的鼓舞。

1986年4月8日，我走進了沈伯伯和兆和姨在崇文門東大街的新居。這地方寬敞了許多，牆上終於掛上了黃永玉先生的畫作，窗外也有了一些街景。我非常喜歡黃永玉先生的畫，沈伯伯總是看著牆上的畫，心境平和地跟我說說湘西鳳凰的美景。7月17日，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沈伯伯。

從1986年夏天到88年夏天，我在曼哈頓，忙中偷閒，試圖完成長篇《折射》，書寫的過程痛徹心肺，瘂弦先生來信鼓勵，「把她完成」！有如進軍號。這本書誕生的時候，中國正經歷著近代史上最劇烈的震盪，或者說曾經是最有希望的一個極其短暫的時期。1989年1月，正在為中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走向現代化而拚命工作的老朋友從北京寫信來，他處在極度困難中，遭到共青團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書記數次書面批示嚴詞批判。87年，我在小說〈不惑之年〉中的預言在兩年後被證實。祖光先生早有預感，中國的政治改革會受到蠻橫的阻滯，直面文革苦難的呼聲會被壓制，趁著稍稍寬鬆的當下，能做的事情要趕快做，否則就「來不及了」。89年，這個預感完全地被證實了。

智者的預言

1989年5月，天安門前，波瀾壯闊。軍隊進城，市民與軍人對峙，全國各地風聲鶴唳。6月初，我收到周有光先生託人從香港寄往紐約美國駐聯合國使團，美國使團又快速轉給我們的來信。裡面有一篇文章〈東方在天亮〉，周有光先生在文章裡講到天安門前的悲壯場面，文章是5月19日寫的，旗幟鮮明地呼喚民主朝霞的升起。一封短信，卻講到新聞封鎖，「請告家庭住址，以便通信，家庭信可免檢查」以及「此信帶香港發出」字樣，極為匆忙。這封信是5月28日在北京的家中寫的，是局勢大變以前寄出的一封信，字裡行間，他們已經預感到事情即將發生。我手裡捧著這封信，心跳加速。此時，電話鈴急響，我從前的學生，當時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擔任科長的貝德先生打電話來，「Teresa，羅德大使認為不會開槍，你覺得怎麼樣？」我的直覺便是，什麼都來不及了，對著話筒大叫，「馬上就要流血了，這場民主運動沒有辦法善了」。話音未落，電話裡傳來了密集的槍聲，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電話直接地收聽著北京的市聲。跟著，便是一連串憂急、傷痛、緊張、忙碌的日子。

老同學的來信，字裡行間充分肯定劉曉波對於中國社會的啓蒙作用。更重要的，他期望著政治改革的成功，認為這是極難得的一次機遇，如果錯失，便是中國的不幸，甚至很可能是世界的不幸。我收到信的時候，這個難得的機會已經完全地失去了。過了二十多年之後，這個機會也還沒有再現。一個政黨為了自己的權利而將整個國家的進步拋進了深淵。高齡一百零八歲的周有光先生到了2013年還在呼籲民主，還在期盼東方的天亮。

與大陸知識界在高壓下的沉默相反，台灣報界一片斥伐之聲。我至今收藏著台北《聯合報》與美國《世界日報》的大量新聞報導。6月7日，《聯合報》副刊陳義芝先生寫信來。詩人在信中大聲疾呼，「青年何辜？血怎可繼續狂流？」義芝先生也告訴我，副刊同仁花錢買廣告，要求政府立刻拿出具體行動。我一直珍藏著這則廣告，上面有著瘂弦先生、陳義芝先生領軍的十三位副刊編輯朋友的親筆簽名。文章中所提出的十項主張都是當務之急。我對其中兩條特別有感觸，第七條，呼籲全世界華人暫停在大陸投資。第九條，請國立編譯館將天安門學運、屠殺事件編入各級學校教材，讓子子孫孫永遠記取血淚經驗。

很快，世事就朝著另外一個方向走去。1989年7月1日，瘂公寫信來，談到人性的扭曲與健忘，「再過半年一年，鄧小平李鵬換個調子吹奏，就會有人跟著起舞」。這是智者的預言。二十多年過去了，跟著起舞的人何其多。土改、大饑荒、文革、六四統統是「禁區」。禁區多多，海內外的文化人不用人催，自動閉口，只寫逢迎文章，又是何其多。如此，血跡被掩蓋，上面蓋些高樓大廈，狀似繁榮。年輕人便鮮少眞正知道「新」中國是走在怎樣血跡斑斑的一條路上。

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被選擇出來的記憶是歷史的一小部分，經過長年沉潛，這些記憶重新排列組合，成為小說。這些小說卻未曾站立在高樓大廈上，它們站立在中國的黃土地上，它們沉重如鉛塊，它們有如一面鏡子，折射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過往。（轉載自2014.2.6《聯合報》副刊）

作家的書房——有光的所在

◎陳文發

十多年前，因拍攝「詩人群像」專欄，曾前去李敏勇在敦化南路的居所拜訪，在他書房裡取景拍照。印象中，那是一間在高樓之上，有一扇面向大馬路的窗戶，可以引光進來的書房，那是一間三面牆被書架覆蓋的房間，書架上一行行的中外書籍，排列得分明整齊，一張書桌、一張椅子，書桌上還有一支被詩人暫時放下未闔蓋的鋼筆，與一疊未完案的稿紙，它們正期待被完成，被賦予靈魂與生命。

在幾次李敏勇寄贈著作的信封上，我發現寄件地址並非他家中的地址，寄件署名是「李敏勇文學工房」，我對這看似一個公司抬頭又與文學有關的名稱感到好奇，想像中它可能是李敏勇的辦公室中的一間藏書房，裡面收藏了很多他歷年來讀過的豐富藏書，以及他行過文學之路所留下的痕跡。又有一回在活動中遇見詩人的夫人蘇麗明女士，她向我說：有空來新生南路的書房坐坐，她這麼一說，又讓我對於從未去過的空間充滿了想像，那裡到底是李敏勇的辦公室？還是他的書房？

去年冬日，我終於踏入李敏勇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上的書房。李敏勇的這間居家以外的書房，座落在玻璃帷幕的商業辦公大樓的高層之中，進入一間公司，沿著現代化的辦公室屏風格局，走入建築物室內底端的一角，進入其中，窗外高亮度的光線，穿透落地玻璃帷幕牆面，讓室內中的一景一物分明立體。

李敏勇從辦公室外邊端進來兩杯黑咖啡，我們坐在事務櫃的兩端，他說：這裡就是我每天來上班的辦公室，是我的工作室，也是我的書房。我問：您說來辦公室上班的意思是？他說：1987年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巡迴在美國各地的台灣社團演講，前往聖地牙哥之前，台灣剛剛宣布解除戒嚴，在太平洋沿岸公路的海邊停留時，我想到波蘭流亡詩人米若舒的一首詩〈禮物〉，讓我感觸很深，當時我四十歲，正是年輕力壯時期，我當下給自己定下目標，在生命最好的時光，我要更投入文學創作與積極介入社會活動。

李敏勇在2007年獲得國家文藝獎之前，他辭卸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現代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六十歲後，他不再將太多的精神放在社運組織與文化運動團體上，保留更多時間在文學寫作上。他說：我要回來，才越有時間寫作，至今已六年，又陸續出版了二十多本著作，現在讀書、寫作，已成了我每天來辦公室最主要的工作，我每天早上九點來，中午十二點搭公車回家吃飯午休，下午兩三點再來辦公室繼續工作，除了有事外出、演講等活動之外，我幾乎每天來辦公室上班。

我問：辦公室與家中書房的書，有特別分類嗎？他說：也沒特別分類，辦公室已成為我現在最主要工作的地方，新來的、新買的、新看的，經常用的都放在這裡，家中的書房反而有點變成儲藏的意味了。我問：那您下班回家，會挑幾本書帶回家看嗎?他說：我上下班都會看書，我習慣搭公共交通系統，我搭捷運、公車上下班，在車上就能閱讀，所以我隨身習慣帶書在身上，也習慣把隨時隨地看到的一種想法與代誌，隨手記錄在記事本上。除了坐車，我還經常在秋、冬兩季與初春走路上下班，趕時間或下大雨，才搭計程車。

我問：您寫詩作、隨筆、翻譯、政治評論、文化評論等，每年持續出版多本著作，還在各報刊寫專欄，您怎麼會有那麼多時間寫稿？他說：寫作已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我曾經有段時間一個禮拜必須交出四、五篇專欄稿件，從1987年我就開始在首都早報上寫專欄，1999年開始寫自由時報的「鏗鏘集」專欄至今，每個禮拜一篇，原本有七人，只剩我一人還持續在寫，我從未脫稿，也沒慢交稿過。我現在還為《人本》雜誌寫〈詩的二十堂課〉，在《笠》詩刊上寫〈阿笠談詩〉。2007年李敏勇獲得國家文藝獎，他將六十萬元獎金用做「一個人的文化運動」基金，2008年開始每年捐書給台灣高中以上及一些專門圖書館，大約五百至一千家圖書館。他說：我很不愛與官方接觸，因為台灣文學界的條件，根本無法與社會對話，文學相對弱勢，依賴官方被視為救濟，所以我以個人名義尋求企業界朋友一起來共襄盛舉。

李敏勇認為，作家本來可以靠個人獨立的力量，作家的著作可以讓社會經由購買提供版稅，支持作家的生活條件，作家的力量來自這裡。但是台灣的社會沒有這樣的條件，就變成依賴官方的支助，官方的支助有侷限性，無法支持一個作家靠寫作生活。李敏勇說：我很早以前就意識到要從事寫作，就得要在企業界做代誌，七〇年代我在企業界做代誌，後來常常在扶輪社演講，因而熟悉一些企業家，與他們成為好友，我在文化、社運與企業界的機緣也較特殊，提供一個讓我充分行使寫作的空間，我除了文化上的寫作之外，還有社運的關係，以及文化與企業的關連。